

大众历史经典馆

我对历史的看法

大师写给大众的经典历史读物

黎东方 著

插图珍藏本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对历史的看法

黎东方 著

插图珍藏本

中国工人出版社



©黎东方

本书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授权中国工人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56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对历史的看法/黎东方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5008-4047-3

I. 我… II. 黎…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94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9.75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代序）

□ 唐德刚

黎东方教授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了。黎教授抗战中期曾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授过课。笔者本人当年就是他班上的学生。我们中大旅美校友会正在磋商有所表示之时，便收到洛城方面治丧委员会电话，要笔者附骥为治丧委员，并嘱撰一副“挽联”。那时我们的反应是，黎教授是位现代学人，哪还需要什么古董挽联呢？但是稍后我们还是写了一副，如下：

研百家，成一家，轻轻松松，便为巨帙，寰宇同尊弥勒佛。

讲三国，说民国，嘻嘻哈哈，不拘小节，全侨永忆地行仙。

有的朋友看到了，就认为“嘻嘻哈哈”，有欠严肃，怎能写入挽联呢？但是深知黎老师的人就同意这四个字，对其他前辈逝者，可能是有欠严肃，但是追念黎老师却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早在他的青年期，由于时代关系，他从国共合作时的热血爱国青年，到国共分裂后的孙文主义者。后来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

黎老师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从未垂头丧气，或愁容满面的悲哀过。他生前对人对己，永远是一位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今天走了，不论是下去九泉，或上入九天，在那个超自然的世界里，他显然地还是一尊笑口大开的弥勒佛呢。你把他说成哭哭啼啼，把生死看得太严重的迂夫子，就不是黎东方了。他九泉有知，也要显圣抗议的。果不其然，在黎老师的幽灵感召之下，据媒体报导，洛杉矶那个追悼会里，毫无悲哀气氛，甚至开的喜气洋洋呢。这才是追悼黎老师应有的气氛嘛。他如回天有术，重返红尘，或许他也要加入吊者行列，嘻嘻哈哈，说几个轻松自嘲的笑话呢？

东方学的历史位置

黎东方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子，幼读南洋大学（今交大）附中（后称南洋模范中学）便是个颇为突出的小灵精，后来闹革命被开除学籍，他竟能以同等学力，逾格考入清华。清华当年是好考

的？清华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获保送留欧，与他同去的是后来也做了我的老师的张贵永（字致远）先生。张进柏林大学；黎则进巴黎大学。在那个时代，美国学术还在力争上游，美国世家子（像费正清）都还要去欧洲留学呢。中国的留欧学生像陈寅恪、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对留美学生，还怀有优越感呢。但是他们也和留美学生一样，多半未能完成其博士学位，可是张贵永、黎东方却是毕业于两所拔尖大学中的、货真价实的博士，他二人都因学龄甚早，两个都长个娃娃脸，看来不像一般想象中头上无发、腮下多须的老博士。因此，曾惹起许多有趣的故事呢。有人曾说他是个黑牌博士；对功名也颇为看重的黎老师，一生都为此诬蔑而愤愤不平。

可是张、黎二人在个性和治学方面，却是两个极端，张是位谦谦君子，求深，求专，不务虚名，黎则是个才子，中西文史，无不涉猎，笔端常带感情（他是梁启超的及门弟子），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几乎无一而非所长也。战时在中大兼课，黎氏开的便是“先秦史”，顾颉刚老师所授的则是“商周史”，两课几乎同时。我曾兼选之以为比较也。论精论专，黎固不能与顾相比，因为上古史是顾的专业，名闻全球；而上古史却是黎老师的三国演义，自然相形见绌。但是一个票友，能和梅兰芳，对台同唱，亦颇足自豪矣。

杂家也是家，东方朔也不朽

战后我留学哥大，黎老师其时正在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海外重逢真不胜欢乐。那时我们还是青年，黎老师四十许人，学生甚多，中国式的程门立雪不再有了。黎老师也就变成我们的小鬼大王了。跟我们那些小鬼在一起，不用说他还是我们之间学问最大、经验最丰、故事最多的前辈老师。在沙坪坝学中国上古

史，他是我的老师；虽然和顾老师不是一个阶层，但是黎老师的汉学底子深厚，对训诂、辞章和音韵，还是有其基本训练的，至少还不会说外行话，不像他的受欧美汉学训练的华裔后辈，他们往往对应有的汉学基本功毫无所知，而不知其不知之可悲也。

我那时在哥大正在补修欧美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类的课。黎老师则在美国大学本科里教一些类似的课程。我们虽不同校，在学习等级上，黎老师仍然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有时也觉得黎老师，也应该和我同课，到哥大班上旁听旁听才好；但是我对他的感觉还是和当年沙坪坝上一样，搞上古史，他搞不过顾颉刚，但是也有他一定的地位。现在在美国搞欧美史、现代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他算不得是专家之列，他也有他一定的成就。前一天晚上，浏览了几本书，第二天早晨上课，他就能口角春风，说得头头是道，原原本本；这是黎老师最大的长处；但也是他治学，和搞党从政最大的短处。他是以天才，以兴趣来一套天马行空，不愿自设樊笼作茧自缚来白首穷经，或钻其牛角。但是他在现代史学里各个角落，都有他极为可观的“高等常识”（这是早年中共史专家萧作梁对胡适的评语），为自视甚高，而其实欠通的后辈博士们，所万难望其项背的。

像黎公这样的学者，在我国古代便叫做“通人”；叫做“杂家”。杂家自有其不朽的地位的。杜甫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种尔曹太多了，他们也就帮忙突出了黎老师在学术上一定的地位。

黎老师不是一位对功名富贵、妻财子禄都毫无兴趣的伯夷、叔齐，其实伯夷、叔齐也只是司马迁指桑骂槐的成品。黎老师对功名富贵，也还是相当热衷的；只是他那不可救药的玩世不恭的本性，害苦了他。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装模作样的来遵守“官箴”，入太学当博士，领博士弟子，也要鞠躬如也，恂恂如也，侃侃如也。黎东方野性难驯，虽有心学习，却无此天资，所以

他就学阀官僚两无缘了。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改邪不能归正也。呜呼哀哉。

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为黎东方时，他说，他的原意是东方黎明，而不是汉代的滑稽大师的东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结果却做了一辈的现代东方朔。朋友，做东方朔何伤哉？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出了四百余人，您数数看，知道几位？但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这么一位声名赫赫的东方朔。我的老师黎东方，就是一位现代中国里具体而微的东方朔。作个现代东方朔，亦足垂不朽矣。

与黎老师同时被捕的趣事

记得当黎老师和我在纽约重逢时，那时我是个半工半读的博士生。一位好友郭广林，为黎公的河南同乡后辈，曾买了一部破车，不时开我们师生于纽约通衢大道之上，风驰电掣，亦颇自得其乐。一次为着牌照逾期的的小事，在熙熙攘攘的长街之上，被警车拦下。那是一九四九年啊，中国留学生有车者绝少。一时看到警车两部光芒四射，围拢而来，我三人都被弄得十分紧张，不知所措。我因坐在后座，车门失修，下车困难，一时未动，黎教授则坐于前座，他一时慌张，乃夺门而逃，未出数步，便被两个足有二百磅重的肥大警察，追向前去，抓着衣领，把瘦小的黎教授像捉小鸡一般捉了回来，塞入前座。接着郭君也被警察拉入警车。这时大街之上，观者如堵，途为之塞。另一警察乃驾驶我车，浩浩荡荡，把我们师徒三人，捉将官里去。

在一个警长的高座之前，我三人被排列整齐，首要举手宣誓，只说实话，不言谎语。继则要我三人，分别陈述，是犯罪，或是有

冤要申。我记得在此简短审讯中，黎教授发言最多。他说他是位教授，这两位毛头，只是他的两个“相识”，并无深交，云云。所幸我辈犯法不大，乃被判无罪开释。警长怕我们在返家途中再遭误捕，乃温语叮咛，设再有警车拦截，应告以“已在第 23 Precinct 审结免究”矣。我三人乃鞠躬，道谢而出。还至车上，黎教授还不失幽默地说，“哎，此地还是个监牢呢。想不到我们三人倒在纽约大牢中，做了难友。”那次我们三人都还不认识 Precinct 这个英文单字，把它当成 Prison 误读了。思之可笑。

其后长逾半个世纪，黎老师和我们几位老学生，总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失去联络。偶尔在一起时，听他高谈阔论，嘻嘻哈哈，数十年如一日。老师不是个腾云驾雾的佛祖真神，却是和我们在一起，潇潇洒洒、看山玩水的地行的游仙。今日他忽然撒手而去，对一些数十年来，都追随他嘻嘻哈哈的无数小鬼们，真若有所失；若有所失。只希望老师此去，不管是上在九霄，或下在九泉，仍然是嘻嘻哈哈的一尊，永垂不朽，笑口常开的弥勒老佛也。阿门。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深夜奉刘社长

绍唐兄电嘱勿草

目 录

目 录

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代序）	唐德刚（1）
我对历史的看法	（1）
中国历史的大特点	（14）
历史上的中央政府	（28）
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	（34）
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	（37）
中国人的科学成就	（48）
孔子传略	（57）
战国秦的发展	（121）
楚汉战史	（124）
董卓吕布等等	（162）
三国战史	（175）
东吴人才	（210）

淝水之战	(218)
一个拼命的留学生玄奘	(222)
王安石	(235)
耶律楚材	(247)
张居正	(258)
吴三桂觉悟经过	(272)
历史系课程的问题所在	(281)
一个教书人的感想	(286)
适之先生二三事	(292)
虽不重演，却非偶然	(296)

我对历史的看法

因为我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便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篇关于民生史观的文章。在这里，我应该提起逝世已久之纪云樵同志，当我还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从革命高潮笼罩着的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勉励我在这一方面努力。现今时隔近二十年，而我的学业依然无甚成就，这是我引为十分惭愧的。

一直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敢以民生史观的标题来写一本书，或是一篇文章。这由于我关于历史的书籍读得太少，关于历史的内容又观察得太不充分，并且总理孙中山先生所留给我们的论及民生史观的遗言，又如此的简括，令一个仅获见总理一面而未能亲承教诲的后生如我，不敢于许多不明了的地方妄加揣测。因此在今天，我只敢写一些我个人对于历史的看法，不敢说这就是民生史观。

严格地说，以我的学力而论，我配不配已经有一个看法，根本也成问题，只是权且写来，作为一种读书报告罢了。

所谓历史，普通只是单指人类历史而言。若就广义的字义来说，则凡是宇宙间一切曾经有过的现象，都可以称做历史。

这便是历史一词的真义。它是过去了的，它是杳然不可捉摸

的。史料仅是它的残骸。我们凭藉一点点史料，来写历史，或讲历史；无非是按照我们从“现在”所得的个人经验去想象“过去”的情形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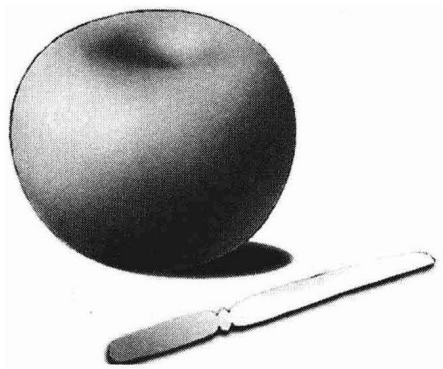
况且我们每一个人所能接触得到、体验得到的“现在”，也极其有限。我们连记录一部现代史资格都没有，焉能写出人类全部过去，或甚至把握整个宇宙过去，以探寻其中进化的轨迹？

诚然如此，困难尽管困难，人们追求理解的欲望却随着每一时代哲学与科学的进步程度，而时时表露出来。远在西洋有正反合的历史解释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治一乱的见解。在西汉我们又有过五行相生相克的历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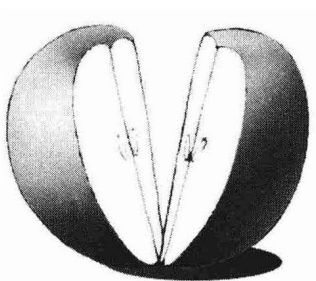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业已过了一半的今天，各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从一个先定的原则出发，以演绎的方式去推论各时代的历史发展。我们似乎只有采用归纳的方法，先集中一切可能有的材料，加以分类与标明，求得其中的同异：从同的里面找出一些原则，再把所异的地方加在那些原则里面，作为制限。

如此的方法虽未必即能给予研究者以正面的结果，却能在消极方面先打破若干错误的成见。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姑不必论，一治一乱的说法就立刻显露了它的破绽。我觉得治之日短，而乱之日长。人们惯言商代有五治五乱，我觉得在商代三十一位天子之中，若仅有成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五朝是治世，则其余二十六朝便是乱世。商代应该称之为五治二十六乱。汉唐两代，比较地可以称为盛世，而按其实际，前者仅有文景之治，后者仅有贞观之治，为时均不甚长。西洋的历史亦复如此。所谓罗马帝国，也仅有安东尼一代可以称为黄金时代而已。至于一分一合的说法，也是分的时候未必相等于合的时候。倘若所说的合，是指的中国之“本部”，则夏商西周为合，春秋战国为分，秦汉为合，魏晋南北朝为分，隋唐为合，五代两宋为分，元明清又合。究其实际，则合中有分，分中

有合。我们即便承认此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的公式，包含有一张一弛的真理，也得不到什么实际的教训。因为倘若我们是处在某一“合”的时期，我们并不能预言究竟要再经若干时日，又入“分”的阶段。



对历史应该用几分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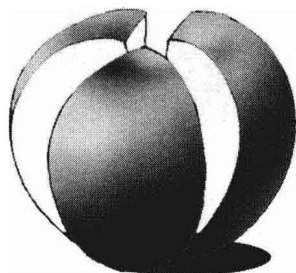
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可以称为历史的两分法。

这一治一乱与一合一分，可以称为历史的两分法。正反合的说法，便可以称为历史的三分法。就内容来看，三分法似乎要充实得多。三分法说一切的制度与文化，都要由正变为反，由这个东西变成不是这个东西，末了又变成兼有这个东西的原来成分与反于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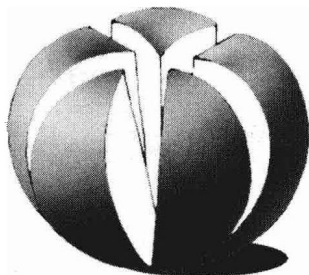
东西的新的成分。这比起一治一乱、一合一分、循环主义的旧看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然而人类历史之中，也确包含一些循环重演的现象，又包含一些昙花一现，正而不反，或反而不合的东西。进化本身，实在没有正反合三字所暗示的那么整齐。

在我们中国，还有另一种四分历史的办法，便是穷变通久四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我感觉到它的内容，比起正反合来，又要充实一些。它而且不是循环主义的：第二个穷字是

正反合的说法，可以称历史的三分法。三分法似乎要充实得多。



中国还有一种四分历史的办法，便是穷变通久四字。还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五分法……





浩瀚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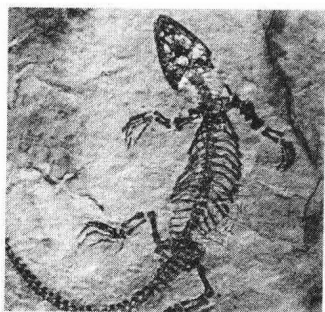
可惜我们已知的宇宙历史，实在是太少了，还不能从宇宙史与人类史的比较之中，求得若干共同的现象。

变了以后的穷，是另一制度的穷，并非原来制度的穷。这似乎是很合理的进化过程。问题在于：穷的时候未必能变。是谁来变？是制度本身会变？还是有人来将它变？既是要靠人来变它，人也许有时不懂得，或不愿意来变它呢！

五德终始或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五分法。可惜它以金木水火土来与历代的祥瑞相配合，未免太牵强。金的确能克木，金也的确可以称作“为土所生”，但这似乎是一种“数学”，而不容易引用到历史上面来。

狭义的历史既是专指人类的历史而言，则人的成分自然不容忽视。倘若历史的本身会变，而人类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则此种变的背后，若不是上帝，定为一种支配宇宙间任何变动的“总原则”。截至现在为止，此“总原则”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退一步说，我们在没有发现它以前，姑且承认它有；它所支配的历史，是谁的历史呢？是宇宙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包括其中。



可惜我们已知的宇宙历史，实在是太少了，还不能从宇宙史与人类史的比较之中，求得若干共同的现象。我们仅能知道，由星云而产生太阳，分出地球，造成太阳系；在地球上，先有火，后有岩石，后有水，后有生物；在生物之中，先有水生之下等动植物，后有登陆之较高等动植物，先有无脊椎动物，后又有脊椎动物，最后又有人类。这样说来似乎全是顺利的发展，却完全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其实如此的发展，包括了不少次的挫折，又依赖了无数的不可预期的“巧合”，才偶然侥幸而有如此的结果。老实说，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存在，能够进化到一跃而为万物之灵，也的确是侥幸。

这侥幸或“巧合的作弄”也许便是宇宙间一切变化的总原则吧？那又未免太近于悲观了。真正的总原则，似乎便在那侥幸与不侥幸之间，靠巧合与不靠巧合之间。

我们所谈的历史，毕竟是只谈人类的历史。那支配一切的总原则如果存在，当我们专谈人类历史的时候，也应该先支配了人类，再表现到人类的历史上面来。撇开了人类本身，人的本性，来解释

